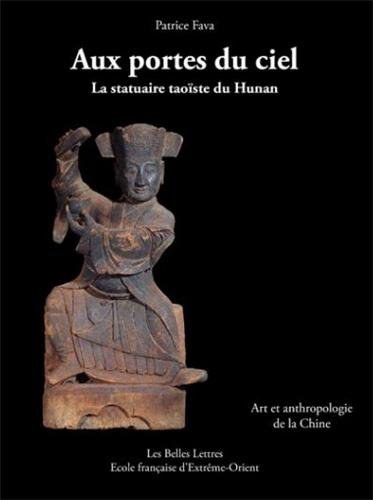
 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 Patrice Fava.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et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4. 656 pp.

**書評**

2014年，范華（Patrice Fava）的《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的藝術和人類學研究》（以下簡稱《通天之道》）一書由巴黎的美文出版社出版。這一研究緣起於1992年作者在廣西陽朔市場上注意到的一組來自湖南的雕刻神像，以及由此引發的探秘之旅。按，這些神像多刻於清至民國時期，一般由稱爲‌“丹青處士”的匠人進行雕刻和開光。神像背部的龕洞（亦稱臟箱）中大都保存著一種開光之時放入的文書，俗稱‌“意旨”。在近二十年的考察基礎之上，作者完成了這本圖文並茂的專著。

此書主要由‌“探秘始末”、‌“道教社會”和‌“法器”這三部分組成。其中，‌“探秘始末”部分占了正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可謂此書的主體。這部分內容大致以時間為序，以作者對湖南雕刻神像的發現和實地考察為主線，漸次展開。它就像一部順敘式的民族誌電影，清晰地呈現了作者確定田野考察地點、進入田野和展開田野工作的過程，及其在此過程中圍繞著湖南雕刻神像這一主題而進行的觀察和思考。通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道教在湖南中部地區宗教圖景和社會生活中所佔據的核心位置。作者亦正是經由這段探秘之旅，將其考察的重點放在湖南的‌“道教社會”（société taoïste），並在《通天之道》第二部分利用一批雕刻神像及其意旨對此作了進一步詮釋。第三部分討論的法器可視為一种聯結道教與社會之器。

現在，讓我們來回放一下的作者探秘之旅。其給人印象最為深刻者是湖南道教中道士和法師這兩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的儀式傳統。正如新化縣玉虛宮和東嶽廟所顯示的那樣，道士和法師擁有各自的網絡。玉虛宮是明初官方設立的道會司所在地，主祀真武和當地道士公認的祖師，在真武誕日有道士主持的重大慶典。東嶽廟主祀東嶽大帝和當地法師公認的祖師，在東嶽聖誕和祖師忌日有法師主持的重大慶典（頁37-38）。此外，道士的傳統顯然與龍虎山有著密切的聯繫。法師的傳統則與中國東南普遍流行的、以臨水夫人崇拜為特點的閭山法有一定的淵源（頁178-179）。道士和法師擅長的法事亦有所不同，前者為醮和超度道場，後者為驅邪和請太公、請菩薩、接娘娘等神明誕日慶典（頁42）。作者不僅提供了這些法事的個案分析（頁136-175；356-377），還分析了一個具體村莊——道士和法師的法事經常在這樣的村莊中舉行——的道教壇廟系統（頁176-191）。

和法師相比，道士在法事中尤其注重通過文書來‌“交通”鬼神。1843年的一種道教鈔本所收‌“呈章飛行三界之圖”對此表露無遺（頁68-87）。這幅圖還和‌“老君骷髏”圖（頁88-93）一起完美地詮釋了道教關於人體小宇宙和身外大宇宙之間的對應觀念。道士和法師均對奏職授籙儀式——正式獲得教內身份的標準途徑——極為看重。1997年一位道士在當地奏職時所獲職牒與天師府直接頒發給道士的職牒很像（頁201-205）。法師的奏職文書一般置於一個稱為兵牌的長方形盒子之中。《通天之道》書中完整展示並初步分析了兩方兵牌中的法師籙牒，其中一份稱為‌“鬼名經”（頁205-235）。這兩套籙牒可以說是法師授籙儀式研究，以及道士、法師傳統比較研究方面極為珍貴的資料。

道士的職牒表明，給受籙者奏撥元帥神及其副將吏兵以助其行法是授箓的重要內容，顯示了元帥神在道教神譜中佔據的重要位置。與元帥神同樣重要的是雷神。這種格局的形成顯然源於宋朝開始的道教儀式革命（頁240），即近年學界所稱之‌“宋元新道法”的發展。《通天之道》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元帥神，進而考察了湖南的道教神譜（頁240-310）。

接著，作者考察了雕刻神像的起源、雕刻者、開光儀式、構成要素、奉祀語境、發願和驅邪功能，神像所見地方不明教派、梅山獵人和仙人崇拜，以及神像開光和神明封聖實踐背後國家與地方的關係（頁311-417）。其中關於神像雕刻者的部分，作者主要討論了湘贛交界處的一個雕刻匠人世家。有趣的是，這個家族的雕刻師自稱處士，自認屬於‌“華山教”，像道士一樣通過度職儀式來取法名，並奉宋代的陳摶真人為祖師。據說，他們基本只會做神像的開光儀式，‌“完全是道教的那一套”。其中，名為打猖的科目需要且只能在為吃葷的非道士神明開光之時舉行。

最後，作者還梳理了湖南神像研究史，其中提到華瀾（Alain Arrault）等學者對是否在討論湖南雕刻神像之時使用‌“道教”一詞保持著謹慎態度。筆者以為，與其說他們持有不同觀點，毋寧說他們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范華的研究視角主要是人類學的，注重從當下出發去看‌“道教社會”的存在形態和實際運作。華瀾則主要從歷史學的視角切入，更關注道教等制度性宗教向地方滲透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文化後果。

此書的資料基礎主要由作者搜集的神像及其意旨、田野考察期間搜集的宗教文書和訪談，以及傳統傳世道書構成。相應地，書中的分析尤其注意將研究者的觀察和教內人士的理解結合起來。這種分析方法在處理宗教文獻時無疑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稍有遺憾的是，作者重視教內文獻和教內理解的同時，並未對地方文人文集、族譜、碑刻等其它文獻加以利用。這些文獻同樣包含了很多涉及宗教實踐的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往往出於和研究者、教內人士不太一樣的視角。

或許是受到主題和篇幅的限制，《通天之道》一書雖然對教派和法派有總體的介紹和分析，但未作全面的展開，還有一定的討論空間。首先，神像雕刻師處士的脈絡還不是特別清楚。書中主要考察了贛西北的一支華山派。可是這支華山派的活動區域位於湖南雕刻神像實踐的邊緣地帶。此外，‌“華山派”並非處士普遍使用的詞彙。例如，不少處士自稱‌“中梅弟子”（頁485-491）。其次，道士、法師、僧人、靈媒、處士等儀式專家，以及很多法派不明者，他們如何表述自己所屬的傳統，如何看待其它的傳統。這些不同的儀式傳統在‌“道教社會”中如何互動。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神像的原型即為儀式專家，他們的法脈是否在得到傳承。如何結合神像和法脈這兩條線索來考察歷史和當代湖南宗教？當然，若要處理這些問題，那將是另一本書的內容了。

總的來看，《通天之道》一書借助人類學的實地考察，對湖南的雕刻神像及其意旨進行了分析，從而揭示了這些神像的社會和宗教文化脈絡。這項工作無疑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明清以來湖南社會，尤其對道教在其中所扮演重要角色之理解。近年來，湖南雕刻神像已經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湧現出不少成果。儘管如此，《通天之道》仍在兩個方面有其典範意義，即人類學取向的研究路徑和教內視角的分析方法。

（來源：巫能昌）